



龙岩学院奇迈书系

标准语、方言、文字 研究论文选辑

《龙岩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龙岩学院奇迈书系

标准语、方言、文字 研究论文选辑

《龙岩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标准语、方言、文字研究论文选辑/《龙岩学院学报》编辑部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10

(龙岩学院奇迈书系)

ISBN 978-7-5615-6742-5

I. ①标… II. ①龙… III. ①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3268 号

出 版 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牛跃天

封面设计 嘉 彬

电脑制作 张 秋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9.75

插页 2

字数 531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编委会

主 任：凌启淡

副主任：刘国买 杨小燕 林跃鑫 林清书

委 员：凌启淡 刘国买 杨小燕 林跃鑫 林清书
张 强 江清悠 黄素华 巫永萍

序

许多期刊不太喜欢语言、文字之类的论文，特别是方言和古文字方面，主要是涉及国际音标、生僻的文字，校对、印刷都有一定的困难。相关作者不容易找到发表的刊物。而这些论文在原创性、质量等方面都比较可靠，而且往往是在田野调查或者珍贵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当今政府和媒体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势下，尤其显得珍贵。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龙岩师专学报》创刊之初，就非常注重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专门出版了《方言音韵专辑》，其中收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厦门大学、福建师大等方言专家的论文。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了一期推广普通话的现代汉语研究专辑。著名专家的长期关注和支持，是学报编辑部办刊的重要基础。

为了给广大的语言学专家学者提供稳定的发表平台，从 2012 年起，《龙岩学院学报》开设《标准语方言文字》栏目。开设以来，得到广大语言文字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饶长溶、罗美珍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王元鹿、南昌大学胡松柏、福建师大林志强、西南大学邓章应等教授，为《龙岩学院学报》撰写论文，还源源不断地推荐高质量的论文。

本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受到《龙岩师专学报》的多次邀请，发表了多篇有关客家方言的调研论文。此后就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他们长期以来注重语言研究的热情，印象很深刻。2013 年，在《龙岩学院学报》创刊 30 周年之际，他们还跟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一起成功举办了“福建省语言学会年会暨语言与语言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使福建省的语言学研究专家学者聚集在龙岩，提升了《龙岩学院学报》的影响力，也为他们储备了大量的语言学作者。从此以后，为《标准语方言文字》栏目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稿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龙岩学院学报》创刊 30 周年之际，《龙岩学院学报》编辑了《客家学研究论文选辑》，从 30 年来发表的客家研究论文中，精心挑选了一部分，编成了论文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客家方言、客家历史和客家民俗。编辑部还特意邀请我写了序言。他们的《客家研究》栏目，多次获得全国性的奖项。

《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龙协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原主编潘国琪教授，上海市学报学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谭帆，以及我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饶长溶、罗美珍先生，北京大学项梦冰教授等，都题词鼓励《龙岩学院学报》。我也受邀为他们题写了一句话：“研究客家文化，发扬客家精神。”

《标准语、方言、文字论文研究选辑》是从《龙岩学院学报》2000年以来发表的语言文字论文中选取的，主要分成三大部分：方言研究、地方普通话研究、文字研究。精选的论文，都有较高的质量，而且都有鲜明的特色。

《龙岩学院学报》坚持客家研究和标准语、方言、文字研究的办刊特色，定位是很准确的。在不断的积累中，一定会越来越好。

厦门大学中文系李如龙

2017年3月9日

目 录

方言研究

- 方言地理、方言分区和谱系分类·····项梦冰/003
- 汉、傣、苗语“形后名”结构关系比较分析·····罗美珍/016
- 划分客家方言之我见·····罗美珍/022
- 新界客家话百年接触演变的启发·····李如龙/031
- 从《龙岩方言词典》看龙岩话的特点和研究价值·····李如龙/041
- 宁都采茶戏舞台音韵述略·····胡松柏, 刘艳生, 陈 星/047
- 宁都客家话的四声别义现象·····黄小平/056
- 惠州龙门县左潭话语音概略·····严修鸿/063
- 赖嘉禄神父与《客法词典》·····田志军, 白瑞明/071
- 19 世纪以来客家方言的罗马字拼音方案评述·····李惠萍, 庄初升/077
- 日本汉字音读、莆田方言与中古音系声韵比较(一)·····陈鸿儒/093
- 张琴《莆田县志·方言志》考论·····刘福铸/099
- 闽中方言与客家方言的关系词·····邓享璋/109
- 古入声在内陆闽语中的演变·····邓享璋/118
- 龙岩闽南话的韵母链动·····陈筱琪/128
- 南靖礪头客家话的三元音格局·····邱春安/136
- “古无轻唇音”在武平上四乡客话中的特殊性·····曾德万/145
- 福建大禾客家话的语音特点·····蓝慧娟/152
- 闽西双语双方言研究情况简述·····林清书/158
- 山羊隔传承歌谣与畬族的历史源流·····林清书/170
- 与天人感应观相关的福建婚俗语汇·····林清书/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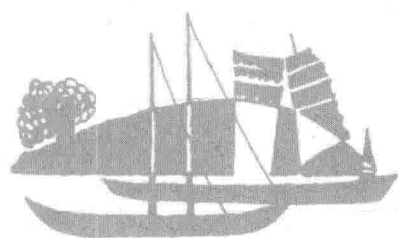
地方普通话研究

- 汉语南方方言中与普通话相异的语法形式探析·····罗美珍/187
- “地方普通话”在汉语中的位置·····林清书/197

闽台客家“地方普通话”调研情况与个案分析·····	林清书, 陈筱琪, 何纯惠/203
台湾汉语方言与“国语”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意义·····	林清书/213
龙岩新罗区“地方普通话”的语音特点·····	王咏梅/220
谈闽西方言区声母正音问题·····	林丽芳/230
刍议龙岩地方普通话中的方言语法成分·····	林丽芳/236

文字研究

壮族古文字的研究价值与待解谜团·····	王元鹿/247
文字学理论研究的新探索 ——《比较文字学》述评·····	朱建军/252
东巴文起源神话研究·····	邓章应/256
方块古壮字的发生时代新探·····	袁香琴/263
卜辞所见殷人心目中的鬼神世界·····	林志强/268
别白行文与北庸父己爵铭文考释及其文化意义 ——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中华地域青铜文明系列论文之二·····	李义海/273
《广韵》引《周易》异文考·····	蒋德平/279
梳理源流沟通古今 ——谈《汉字源流》对汉字教学的启示·····	李春晓/287
江永女书是中国偏僻地区女性的方言文字·····	彭泽润, 李日晴/295
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汉字系文字的比较研究·····	邱子雁/303



方言研究

方言地理、方言分区和谱系分类

项梦冰

摘要：方言分区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方言分区必须以同言线的考察和谱系分类的研究为基础，有些学者把方言地理、方言分区和谱系分类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对方言地理学的一个根本误解。

关键词：方言地理学；同言线；方言区；谱系树

一、方言地理学的引入和早期实践

林语堂对方言地理学的要旨曾有相当清楚的介绍。^{[1]7-11}1924年发表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①提出了七项工作任务，第一项即为“绘成方言地图”。1925年刘复从法国学成回国，10月18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发表题为《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的演说，其将来工作的第二项为：

打算用相当的方法，调查各地的方音，著成一部《方音字典》；如果调查顺利，作工的人也多，还希望按照法国语言地图的办法，编成一部《方言地图》。^②

就目前所知，在汉语文献中最早对方言地理学进行系统介绍的应该是岑麒祥。^{[2]23-73}其文第六章为“方言地图”，分绪言、调查方法、地图的拟制、地图的解释四个部分。作者认为：“方言地图的拟制应该分为（一）编制调查册，（二）实地调查，（三）绘图，（四）解释诸步骤”^{[2]69-73}，而第六章的后三部分就是介绍这些步骤的。

编写于1938年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3]（因日本入侵延宕至10年后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看作是中国方言地理学的第一部作品。该报告根据成规模的区域调查绘制了涉及音类、特字、词类的64幅同言线地图（实际上已转换成面状分布图），对方言区界的模糊性、同言线的绘制方法及其意义、地图符号的使用等相关问题也做了简要的讨论。对于武汉三镇，报告指出虽然其地理位置很偏东，但也属于范围

最大的第一区（西南官话），“差不多成一个方言区的半岛形势”。这实际上是在讨论方言分布的地理格局。^③

1939年来华的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illem A. Grootaers, 1911—1999）同时也是一位语言学者。他曾先后撰文，积极鼓吹调查活的语言和开展方言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性（Grootaers, 1943, 1945）。^{[4]103-166[5]389-426}1947年至1948年间他带领学生对张家口市、万全县、宣化县等地区的民间信仰和方言进行调查，并陆续有一些成果问世。^④贺登崧和他的学生所做的先驱性研究亦可谓出色，不过，一则由于毕竟只是很小区域的调查，二则由于他所理解的方言地理学实际上是一种较为狭隘的词汇地理学，因此他的呼吁和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界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中国幅员辽阔，方言极其复杂，使得汉语方言的调查非短期所能见其功，加上清末以降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学术事业可谓举步维艰，这些都在客观上限制了方言地理学的发展。1956年，丁声树、李荣发表《汉语方言调查》^[6]一文时，已经发表的材料仅有170~180点，而德国1876—1887年间所调查的方言点超过4万个（但项目只限于40个短句），法国1897—1901年间所调查的方言点为639个（项目多达1400个或更多）^{[7]196-222}，如果再对比一下目前三国的国土面积（德国35.7万平方千米，法国55.16万平方千米，中国960万平方千米），中国的方言调查跟西方的差距就一目了然了。在语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方言地理学在中国没有出现一些西方国家的那种繁荣景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直到1981年王力先生出版《中国语言学史》^[8]一书时，在结论中仍把“绘出全国方言地图”作为八项远景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汉语方言的调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以具备稍具系统性的单字音材料（音节表或同音字表）或词汇记音材料为标准，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目前可资利用的方言点数已经超过了1500个。虽然1500个点仍然只能做宏观方面的研究，但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所必需的基础语料无疑已经初步具备。加上汉语方言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日趋成熟，为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突破，尝试不同的方法已经成为一些方言学工作者不约而同的想法。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长期受到冷落、一步一蹶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开始陆续出现一些重要的成果，这是十分令人振奋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学者们对汉语方言地理学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如果不能从理论上把这些分歧的实质说清楚，这门学科就很难在中国得到健康的发展。如何看待方言地理、方言分区以及谱系分类这三者的关系，就是众说纷纭的基本问题之一，本文愿就这一重要问题阐明笔者的基本看法。

二、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

关于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郭必之以“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可以接合吗”^[9]这样

的质疑句作为文章的标题，其立场之鲜明已不用多做解释。不过，在我们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方言分区是以方言地理为基础的，没有方言地理的研究，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方言分区。

所谓方言地理的研究，指的是利用方言地图研究一个个具体语言特征（可以是语音、词汇、语法等不同方面的）在地理上的分布情况。对方言分区来说，还要在特征分布图的基础上逐个绘制出同言线，然后将它们叠在一起，观察同言线之间的空间关系，特别留意是否存在聚集成束的情况。最后按特定的分区目的来确定同言线的重要性序列，优先选择重要的同言线、聚集成束的同言线来作为方言分区的标准。当然，涉及方言地理研究的每一个方面实际上都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讨论，这里无法详述，但方言分区的步骤大体如此。^⑤

西方学者通常都是依照上述步骤去做方言分区的。典型的案例如 Kurath & Lowman (1970)^[10]依据音韵演变的地理分布情况确定英格兰南部的方言区域结构（areal structure，性质大体相当于方言分区）：作者总共绘制了 38 幅方言地图（31 幅语言特征分布图，6 幅同言线图，1 幅语言特征分布和同言线综合图），其中第 33 图是一幅著名的同言线束图（参看^{[11]275}：图 3-16 “纵贯英格兰南部的同言线束”）。被不少语言学著作引用的美国东部的方言区图（如霍凯特 1986 下册所引^{[12]191}），也是在一系列同言线图的基础上绘制的。

郭必之^[9]未能把握住学科发展的脉络，给汉语方言地理学以更多的期许，在一个百业待兴的领域提出“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可以接合吗”这样的伪命题，这是我们所坚决不能同意的。把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对立起来，实际上是方言地理学草创时期抱着离散观念的语言学工作者突然间跌入纷繁复杂的语言现实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反应。

Georg Wenker 于 1876 年开始进行的、代表方言地理学发端的德国方言调查，初衷是想证明“音律无例外”（Ausnahmslosigkeit der Lautgesetze）这一理论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调查研究结果乍一看似乎完全否定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而更糟糕的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方言地理调查似乎还显示出：根本不存在作为语言变体意义上的、彼此可以清楚区分的“方言”这样的东西。法国学者巴黎（Gaston Paris）1888 年发表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就地理观点而言，并不存在“方言”这样的事物；“从法国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方言是以无法觉察的程度彼此迷失的”（d'un bout de la France à l'autre les parlers populaires se perdent les uns dans les autres par des nuances insensibles）。^[7]

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所信仰的观念被突然打破时的那种震惊和困扰：原先多数语言学家都设想方言是离散性的实体，即一个说话人说的要么是某一有特定叫名的方言，要么不是，方言边界是实际存在的；而现在把体现若干方言差异的一幅幅个别特征的地图综合在一起后所呈现的结果竟然是——同言线极少有互相吻合的，

为一个个具体特征绘制的同言线在地图上纵横驰骋，彼此交错，简直就杂乱无章。所谓的“方言”它在哪里呢？

应当说，这种震惊和困扰有着它的积极意义。它使方言学者从理想回到了现实，对方言的连续性有了切身的体会，“方言连续体”（*dialect continuum*）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而且方言学者们也很快就从震惊中恢复了常态。虽然方言是渐变的连续体，但是学者们也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在方言地图上发现模式（*patterns*），即从一张地图到另一张地图反复出现的地理分布格局。有些地区相对较少同言线通过，有些地区则被大量的同言线密集穿插；前者就是所谓的“中心区域”（*focal areas*），而后者则是所谓的“过渡区域”（*transition areas*）。也就是说，虽然方言已不再被视为离散性的实体，但它仍然是一个有效的相对单位；同言线虽然常常不能互相吻合，但一些同言线彼此接近、遵循大体相同的方向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实。方言区在多数情况下不是由一条条线来分界的，而是由一条条宽带（*broad band*）来互相分隔的。而宽带就是所谓的过渡区，即有很多同言线通过、不能明确归属于任何一个中心区域的地带。

以上所述，可以说是方言地理学至少已经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主流观念^⑥，西方学者的方言分区基本上都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虽然“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缺乏拥护者，而且这句口号也并非没有合理的成分，但它跟多数方言地理学家所不断追求和揭示的类型（*types/patterns*）实际上属于“人各有志”、“难以相谋”。郭必之之所以会提出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一个伪命题的疑问，关键就在他对方言地理学的理解跟通行的理解大不相同：“方言地理学主张‘每个词都有其固有的历史’，所以很着重看每个词的不同词形在某个特定地区的分布，希望透过诠释语言地图，重构每个词的历史。”^[9]站在这样的立场，他自然很难理解项梦冰、曹晖所做的分区工作^[11]，而把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对立起来恐怕也是必然的。

三、方言分区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基本课题之一

方言地理学要做的事情很多，通过方言地理的研究探讨理想的方言分区是其中一项重要课题。郭必之对方言地理学的狭隘理解不仅使他认为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在方法上是对立的，而且也使他有意无意地把方言分区排斥在方言地理学的课题之外。“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可以接合吗”这一命题本身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岩田礼持有相同的看法（着重号为本文所加）^{[13]352-371}：

2005年至2006年之间有两本冠名“方言地理学”的综合性研究书出世：一本是史皓元、石汝杰、顾黔三位先生合写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另一本就是本评论的对象——项梦冰、

曹晖两位先生合写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 下文有必要时则称作《入门与实践》)。这两本书均为作者长年调查研究的结晶, 分别都是在大量语料的基础上绘制方言地图并划出同言线, 这种辛苦工作值得称赞。然而两者不约而同地也提出方言分区或方言分类的观点, 甚至在《入门与实践》中似乎占有研究终点的地位而方言地理学则成为为此目的服务的工具。关于本书已有郭必之先生的评论(郭必之 2006)。郭氏评论言简意赅, 我基本赞同。

方言分区之为方言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当属对这门学科的基本认知部分; 如果连这种基本认知问题都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对话就很难是建设性的。本文不想多费笔墨, 只想在这里指出一个基本事实: 岩田礼先生和郭必之先生所奉为圭臬的贺登崧神父所界定的方言地理学, 实际上只是方言地理学其中一个领域(词汇地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已, 绝不代表整个方言地理学, 甚至也不能完全代表词汇地理学。Carver 的《美国的地区方言: 词汇地理学》(*American Regional Dialects: A Word Geography*)^[4], 不算附录和索引, 全书正文 249 页, 所做的主要工作是: 以美国一系列描写性方言地图集为主要基础, 并结合其他方言语料, 讨论美国的方言区划及其与历史文化的关联。作者在书里绘制大量同言线地图的目的就是要探讨美国的方言区划, 以及方言区划的层次、方言区划跟历史文化的关联。可以说, Carver 的工作跟贺登崧神父的词汇地理学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稍微研究一下美国的方言学史, 类似 Carver 这样的著作还有很多部。^⑦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Orton & Wright 的《英格兰词汇地理学》(*A Word Geography of England*)^[15], 其主要工作是以 SED (*The Survey of English Dialects*, 《英语方言调查》) 的语料为基础而绘制大量的同言线。换言之, 它实际上是一部同言线地图集——这跟贺登崧神父所倡导的那种三句话不离“解释”的词汇地理学真可谓是大异其趣了。

对汉语而言, 方言分区在方言地理学里的分量会显得尤其重。原因至少有三个: 第一, 汉语的使用人口多、分布地区广、方言分歧异常严重, 这使得方言分区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还有其不可忽略的实用需要。第二, 汉语的历史非常悠久, 一波波共同语的推平作用和方言接触效应使得要做好方言分区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而追求完美是人类的天性, 没有方言地理学介入的汉语方言分区不可能是完美的。第三, 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语料极度缺乏, 或即便有了一定规模的语料, 处理和消化也需要较长的时间, 中国迄今为止实际上还没有出现过方言地理学意义上的全局性的分区工作, 有的只是方言分类、准方言分区、建模性的方言分区和局部性的方言分区, 因此汉语的方言分区工作亟须补课。请注意, 是否属于方言分区并不看语言学者是否用“方言分区”来称述自己的工作, 而是看他的工作是否遵循了方言地理学有关分区的基本工作步骤。就我们所知, 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位学者是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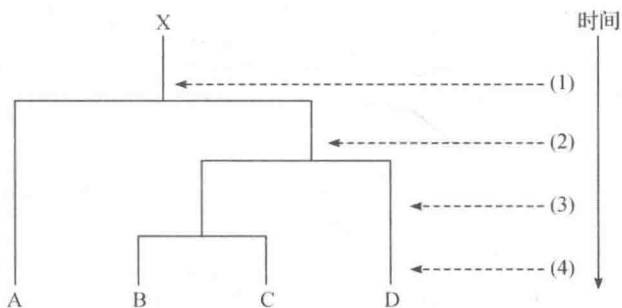
言线的基础上来讨论全局性的汉语方言分区的。^④

郭必之^[9]认为：“现在是适当的时候，以新材料和新角度重新检视方言地理学在汉语中的适用程度。”很遗憾，这句话完全没有说到点子上。方言地理学并非像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一样是一种理论或假说（theory/hypothesis），而是一种研究地域方言的技术或手段（technology/means）。契科巴瓦（1954—1955）对此曾有很准确的概括：“在用绘图法研究方言特征的过程中就产生了语言地理学”，“语言地理学之所以有价值，不是由于它否认了方言的存在，而是由于它有一种研究方言特征的绘图法，它利用等语线及其他符号把这些方言特征分布的情况一目了然地表现在地图上”。^[16]Moulton 也曾精辟地指出过：“大体而论，方言地理学家过去不是、现在依然不是以理论为导向的。”（Geographical linguists in general were not, and still are not, theory-oriented.）^[7]方言地理学之适用于任何一种语言几乎是没有任何疑义的。换言之，只存在使用者有没有把这种方法用好的问题，而不会有方言地理学适用不适用于某种语言的问题。要重新检视的不是方言地理学本身，而是自汉语方言学诞生以来在没有方言地理学介入的情况下所做的种种工作，其中就包括汉语方言的分区方案 and 标准。项梦冰、曹晖不把南海粤语古非敷奉母字今读重唇音的现象看作是存古，不支持晋语独立，都是从方言地理学角度对以往部分工作的重新检视。^[11]78-84,120-121 可恰恰在真正需要重新检视的一项重要内容——方言分区的问题上，郭必之却提出“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可以接合吗”这样的质疑，不仅跟项梦冰、曹晖专题实践（5.1~5.2）的目标龃龉难合，而且简直就是在才刚刚冒芽的庄稼地里泼开水。

四、方言地理学跟谱系分类的关系

一些学者对方言地理学的狭隘理解还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方言地理学跟谱系分类（lineage classification）两者关系的看法。郭必之认为分群（grouping，在语言学里常常相当于谱系分类）和方言地理学之间可以对话的空间并不太多，有些观点甚至是互相冲突的；除非做出很大的更动，否则根本不能把它们配合起来使用。为了便于讨论，下面先转引他的有关论述（省略注释）：

虽然方言地理学和分群同样是以解答语言演变的问题为目标，但两者观察的角度却很不一样。方言地理学主张……（上文已引）分群则讲求运用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和内部拟构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去拟构古语，并根据哪些语言拥有共同创新的特征而判断具体的分群。分群强调系统性的演变，牵涉范围越广的音变越需要注意，不会拘泥于一字一词的特殊变化。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语言分群根本不能用地图表示出来。试看下面这棵谱系树：



A、B、C 和 D 是四种方言，它们都是 X 语言的子孙。假设在时间（1）作观察的话，那只会看到一种语言——X。沿着时间轴把视点往后移，到了时间（2）会看到两种方言，时间（3）有三种方言，时间（4）就有四种方言。我们到底要根据哪一个时间点作为方言分区的标准呢？如果以眼前这一刻为准的话，那每一个方言点都是一个方言区——除非有两个地方的方言完全一样。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像这样的争论：为什么福州话和厦门话相差那么远，可以归入同一个方言区（闽语区），但长沙话和附近的西南官话可以通话，却被分为两个区（湘语区和官话区）。我认为：这正是划分方言区的学者，把一个类似谱系树的模式（不算是严格的谱系树）投射在地图上的结果。由于观察的时间不一致，加上要考虑地理、人口等非语言因素，所以很容易会出现这种争论。作者在 5.1.7.4 节中谈及的“不对称原则”，所针对的正是这个“上位跟下位不对称”问题（纵使书中所谈的“谱系”并非真正的分群，然而道理还是一样的）。但要是我们严格遵从“不对称原则”的话，把所有共时音变都放进考虑的范围，那么每一个方言点都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区，到头来又回到上面那棵谱系树观察时点的问题上。

方言地理学既关心词汇、语法现象的地理分布，也关心音韵现象的地理分布 [上文提到的 Kurath & Lowman (1970) 书名就叫《英格兰南部的方言（区域）结构：音韵上的证据》^[10]]，因此郭必之所理解的方言地理学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这影响了他对问题的认识。方言地理学在研究音律和分区的时候，同样呈现出“强调系统性的演变，牵涉范围越广的音变越需要注意，不会拘泥于一字一词的特殊变化”这样的特点。此外，郭必之断言“语言分群根本不能用地图表示出来”是不符合事实的。项梦冰、曹晖其实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可惜郭先生没有好好揣摩。

项梦冰、曹晖^[11]⁴³ 介绍描写性地图和解释性地图的区别，描写性地图以图 2-16（原始数据地图，第 244 页）和图 2-17（加工地图，第 245 页）为例，解释性地图以图 2-18（第 246 页）和图 2-19（第 247 页）为例，118 页又具体给出了解释性地图的解释依据（鼻音形式计数有错）：

“五”字的南北对立表现为鼻音形式和非鼻音形式的对立。非鼻音形式有 u、